

论 文 提 要

本文通过对建国头三年党进行廉政建设的历史条件、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等方面内容的论述，说明：党在新中国始建，百端待举、百废待兴、十分复杂和非常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极端重视党和政府的廉洁问题，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开展廉政建设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这个时期成为我国建国以来廉政建设的最好历史时期之一；党在建国之初进行廉政建设取得的经验极其珍贵，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当时存在的一些历史局限性也应引起我们今天的深思。

全文分三个部分，约一万二千字。

略论党在建国初期的廉政建设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已有四十一年历史，廉政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经历过曲折的过程。新中国头三年是我国廉政建设的最好时期之一。它不但以“创造经济奇迹”，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而为世人所瞩目，而且以党风好，党政机关及广大干部清正廉明而为世人所称道。在全党迎来党的七十周年诞辰之际，回顾新中国头三年党在廉政建设方面的光辉实践，总结其经验，以此为借鉴，对推动今天的廉政建设，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有益的。

新中国头三年史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是一个革命大转变时期。这一时期廉政建设是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展开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其地位和任务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革命的胜利，我们党由被压迫、被“围剿”、被屠杀的地下党变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领导力量，处于全国政权的领导地位。党的任务也从进行武装斗争，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变为领导人民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变化，使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廉政建设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进行廉政建设在政治上提供了根本保证。我们党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和训练，经历过各种严峻的考验，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和较高的政治觉悟，在老区又初步积累了进行民主建设，精兵简政，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群众办事等领导政权的经验。这些具有良好政治素质的干部，为新中国之初的廉政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新中国初期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革命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有待肃清，西藏尚未解放；全国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尚未进行土改，农民仍受剥削，要完成这样广大地区的土改，任务非常艰巨，斗争也是很激烈的；财政经济困难是当时我党面临的最大困难，国民党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济凋敝，经济结构新的调整又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失业人员，国民党的几百万军政人员也有待安排；加上1949年又遭到水旱灾害，四千万灾民需要救济；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禁运封锁，接着出兵朝鲜，把战火烧到我国门，逼使我们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大大增加了我们恢复国民经济的困难。种种压力和困难，促使我们党的干部处事更加小心谨慎，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严守纪律，秉公尽责，从而把压力转化为动力。这在客观上也为廉政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新中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预料到党执政后可能会发生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

蚀的现象，因此为全党制定了防止腐蚀的方针。毛泽东还告诫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党中央即将离开西柏坡进驻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就要进北京了，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京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建设共产主义。七届二中全会的防腐蚀方针和毛泽东的谆谆教导，武装了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头脑，为新中国的廉政建设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必要准备。

同时也必须看到，党执政后进行廉政建设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由于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的这“四种情绪”，是对我国历史特别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实践证明很有针对性和预见性。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北京后的迅速腐化，太平天国政权的天京变乱，都是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四次大的骄傲，结果都犯了错误，吃了亏，全党要引以为借鉴。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在党进城以后，党内的一些同志并没有对此引起警觉，以致后来实际发生的问题比预料的还要复杂严重得多。一些党员进了城，当了“官”，就喜欢捧场，批评不得，飘飘然，逐渐地脱离群众，变得骄傲、保守、懒惰，贪图享受，滋长了特权思想；少数人顶不住社会上糖衣炮弹的袭击，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或者变成丧失革命热情，毫无政治责任感，满脑子个人打算的庸人。这“四种情绪”是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主观原因。

党在执政以前，长期处于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武器装备和人员数量大大占优势的反革命武装力量，从空中到地面，对我实行围、追、堵、截，战争的生死存亡威胁着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中，想搞腐化也很难，想搞特权也没有可能。但在党执政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②党的地位的变化，一方面为党给人民谋福利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也给革命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革命胜利后放松自己思想改造的人和原来入党动机不纯的人谋私利、搞腐化、搞特权提供了土壤。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革命胜利之后，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虽然被打倒了，但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僚主义和贪污受贿等封建剥削阶级的思想和作风，还会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通过各种渠道，对革命队伍中的干部产生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变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党面临的主要危险将与以往有所不同。由于资产阶级已处于劣势，已不可能同无产阶级进行公开较量，所以，资产阶级用“糖衣炮弹”来攻击我们的党是必然的。毛泽东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③象后来出现的刘青山、张子善这种人，就是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的实证。这是党的干部队伍中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社会原因。

还有一个新的情况，即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队伍发展较快，新党员数量大，有200多万。由于我们党当时还来不及对他们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和训练，其中有的觉悟不高，思想作风不纯，甚至有一些人党动机不纯的人加入党内，这就使党的廉政建设任务变得更加艰巨。据1951年10月中央组织部对半年来整党试点的统计，在试点中自动退党、劝退和清洗出党者一般占党员人数的20%，可见当时党内不纯现象是相当严重的。这些人想凭借执政党党员的称号，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为自己捞好处。新中国初期出现严重的贪污、受贿、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行为，不能说与此无关。

最后，对原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员带来的旧作风影响不能低估。由于我们党对原国民党政府的几百万军政人员实行全部包下来的政策，让他们仍在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及其他政府机构中从事一定的工作，有的还原封不动地在原单位、原部门工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长期在国民党官僚机构中任职，免不了沾染一些旧习气、旧作风，解放初期又来不及及时对他们进行改造，因此从这些人身上反映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在“三反”运动期间查出的贪污案件中，尤以旧人员居多。以上种种情况说明，解放初期廉政建设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

二

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要保证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需要党切实做好许多方面的工作。但保持党本身的廉洁和为人民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应该说是其中最需要做好的两件工作。只有廉洁的党和廉洁的政府，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与自己同心同德，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解放初期，我们党极端重视党和政府的廉洁问题，在紧张进行以恢复国民经济为中心工作的同时，对廉政建设做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创了一个廉政的良好开端。

（二）建设一个人民政权，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确立廉政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千年来极少数剥削者统治绝大多数人的历史从此告终，广大劳动人民由被压迫者变成了新中国的主人。《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从而在社会制度上确立了廉洁的根本政治制度。

由于解放初期还不具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因此，《共同纲领》中又规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全国政协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认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因此党对做好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在新中国最初半年多的时间，毛泽东为指导和推动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先后发了八份电报。1950年前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建设人民民主政权的高潮。

到新中国一周年时，全国已有个十三省、三个行政区和80%以上的县已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在解放初期具有很大的权力。政府的各项重要工作都要通过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然后发动人民参加。在当时，许多地方政府的负责干部要经常向代表会议汇报工作，报告政府每阶段的工作计划，对政府工作中出现的

缺点错误首先进行自我批评，然后让人民或人民代表展开对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的批评。对于政府工作中和干部作风上存在的缺点错误，代表们在会上可以当面提出来，并要求干部限期改正。在“三反”、“五反”运动时，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天津、沈阳、开封等二十一个市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人民代表当场检举和政府干部当场坦白的案件就达4582件之多，会后收到检举信279014件。有些为群众所不满的干部在会上当场得到处理，而为群众所爱戴的干部在会上则受到表扬。

让人民享有切实的民主权力，让政府工作和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的有力监督之下，发现错误，开展批评，及时纠正，多方受教育，是新中国初期我党进行廉政建设的重要步骤。这对改进干部的工作作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密切党群关系，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也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 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加强党内监督。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党为了保证广大党员能够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和同党内可能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做斗争，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实行党内监督。党的这个决定发布后，全国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迅速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地委以上的党委建立了经常的办事机构和配备了专职干部，在军队中团以上的各级党委，及海、空军党委，均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建立以后，同党内各种违法乱纪现象展开了积极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上半年，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各种违纪案件8671起，处分党员8026人，其中涉及党籍处分的301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的案件有295起，处分党员201人，其中涉及党籍处分的136人。1951年下半年和1952年上半年，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案件（不包括另案处理的“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批贪污案件）计48189起，其中涉及省委和军以上干部的案件32起，地委和师以上干部407起，县委和团级干部2711起。

新中国初期，党对违法乱纪的干部，不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在党章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坚决依法办事，违者必究。象当时的大贪污犯张子善和刘青山，都是十几岁就参加革命，案发时也只才三十多岁的党的中、高级干部。他们参加革命二十多年，对革命做过有益的贡献。但当他们背叛了党和人民，蜕变为腐败分子之后，党没有因其过去有功或是党的“大”干部而饶恕他们的罪行，毛泽东亲自批准公审枪决。当时我党纪律严明，秉公执法，这对监督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保持廉洁奉公和做人民公仆，是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三) 团结民主人士，坚持多党合作，以加强党外监督。新中国初期党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非常重视各民主党派政治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十分注意利用和发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建设新中国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他们对党的批评监督作用。

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有六名政府副主席，其中三名（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是党外民主人士，在五十六名政府委员会委员中，约二分之一的委员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政务院有四名副总理，有两名（郭沫若、黄炎培）是非共产党人，政务院下属的各部、委的部长、主任职位，有三分之一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员担任。1951年，党中央专门就“各级政府委员会必须配备适当数目的党外人士”的问题发

了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必须根据统一战线政策由我党与党外人士共同组成政府，“任何地方不容忽视”，“凡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中非党人数的比例太少者，上级党委及上级人民政府不应予以批准或上报”。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遴选上应照顾党与非党的比例”。“党外人士既然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即应享有职务相当的权力，履行与其职务相当的责任。”④

当时，我党所要进行的一切重大活动，都事先与党外民主人士协商，党的领袖毛泽东经常亲自同他们商谈国家大事，还经常把党中央的一些文件和地方的报告送给他们阅看，使他们了解情况。对他们的合理化建议积极予以采纳。象新中国初期我党的第一次整风整干运动，以及我们用“志愿军”而不是用“支援军”的名义派兵赴朝作战等重大党事、国事。就是采纳了党外民主人士意见的结果。对他们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批评意见，党和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和“极为感谢”，并及时将他们的意见批转有关方面认真调查研究，作出负责的处理和答复。1950年5月，黄炎培写信向毛泽东反映苏南川沙、奉贤等县征粮工作中有“偏差”，毛泽东两次发电报给当时的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要他派专人或亲自调查这件事，叮嘱他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从而使苏南征粮中的偏差得到了及时的纠正。

当时我党民主派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政策，在政治上对他们热心指导，组织上积极帮助发展，生活上热情关心，政治民主，广开言路，积极采纳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和诚恳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使民主党派和其它党外民主人士在新中国建设中非常活跃。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取得了成就，获得了锻炼和提高；而且在某些方面对我党和国家起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对党搞好廉政建设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四）在报纸刊物上公开进行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加强舆论监督。1950年4月19日，党为了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容易危害广大人民利益的缺点和错误，为了避免和消除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的现象，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党认为，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因此，党的各级领导必须对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态度，坚决反对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凡要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批评稿件，只要报纸刊物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使未征求或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批评，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触犯行政法律的，交司法机关处理。当然对那种旨在破坏革命事业的批评，则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拒绝。由于有党中央的大力的支持，新中国初期，报纸刊物办得都比较活跃，发挥了舆论工具监督党和政府做好工

作的积极作用。

(五)认真开展整风整党，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以优良的党风促进廉政建设。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解放初期，党为了保证在执政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曾用了极大的精力来进行党的建设的工作，促进了廉政建设。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成立半年多，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各级党委必须在中央的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整风的重点，放在各级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身上。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整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于1951年春结束。

在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三年时间进行整党。这次整党的中心环节，是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随着“三反”运动的展开，党中央于1952年2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5月又发出《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新制定的党员八条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这次整党运动到1954年底基本结束。经过整党，使全党受到了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大大纯洁了党的队伍，有23.8万多人或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投机分子，或是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有9万多人因不够党员条件自愿退党或被劝告退党，改善了党的作风，提高了党员思想政治水平，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极大地促进了党的廉政建设。

(六)严惩党内、政府内的各种腐败现象，向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展开坚决的斗争。新中国初期，曾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因此，党在全力抓好恢复国民经济这一中心工作的同时，对党内和政府内的各种腐败现象作了毫不留情的坚决斗争。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各地揭发出不少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因此，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8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由于党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以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亲自上阵，人民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使“三害”无处藏身，大、小“老虎”纷纷被擒，“三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全国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的干部123.3万，其中党员有19.6万余人，贪污1000万元（1万元等于人民币1元）以上的155916人。根据情节轻重，对他们分别作了公正严肃的处理和处分。

党领导进行的这一声势浩大、成效显著、对全社会有极大震撼力的反腐蚀运动，对旧社会的污毒是一次大清洗，它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党内一批腐败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使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极大地推动了党的廉政建设，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另外，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主要领导人都严格地遵守了这些规定。1950年9月，毛泽东得知湖南正在为他修缮韶山故居和修建从长沙通往韶山的公路，马上写信给湖南省委负责人黄克诚等，要他们立即加以制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⑤。同年5月和10月，沈阳市政府和北京市政府请示中央准备在沈阳市区和天安门前修建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在来函报告上批示，坚决反对这样做，说这样做“只有讽刺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某些党政机关曾动员机关团体和群众向党中央写致敬信、发致敬电、送锦旗、送礼品。1951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向毛主席的工作报告》时指出：这些做法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各地党委对这些现象应当认真加以纠正。中央并规定，今后任何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均不许动员群众给中央和中央领导写致敬信和发致敬电，机关团体一律不许送礼，过节不许送食品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党对廉政建设是十分重视的，措施也是得力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这一时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廉政建设的最好时期之一。

三

如前所述，新中国头三年，党在廉政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作为在几千年封建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要排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此取得的经验也特别宝贵。我们认为，这时期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全党重视，首长负责，各级主要领导亲自“上前线”。这一时期，党中央对廉政建设十分重视。特别是当党发现干部队伍进城不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之后，迅速决定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当时作为党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亲自领导了这场运动。各级党委和主要领导，在一定时期内也都把“三反”运动作为中心工作。为了使这场运动能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批转有关“三反”运动的指示、批语和书信就在百件以上。运动能否迅速发动起来，关键在各级党委和主要负责同志。因此在运动初期，中央的大量批件的内容都是属于端正领导的态度方面的。首先对那些认识好，态度坚决的领导和单位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如毛泽东表彰某军区在“三反”斗争中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要各级领导亲自“上前线”。其次，对那些态度不端正，动作迟缓的单位和领导毫不客气地进行严肃批评，有的甚至是指名道姓，责令他们在群众面前检讨。再次，在全国范围内限期展开运动，严辞督责，促使各单位领导立即行动起来，有的单位领导甚至在元旦那天也在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开展运动问题。最后，规定报告制度，各大单位均应定期向党中央报告运动开展情况，否则严厉批评，甚至撤职。正是由于从党中央主席到各单位主要领导的极端重视和在第一线亲自发动和指挥，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同各种腐败现象展开坚决斗争，因此反腐败运动才能迅速得以发动并最后取得重大胜利。

(二) 通过整顿, 不断提高干部党员的政治素质。在反腐倡廉中, 提高干部党员的政治素质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解放后党通过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 通过各项社会活动让党员接受锻炼, 大大提高了党员的觉悟。而通过整顿来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 效果尤其显著。首先是从1950年5月开始的新中国全党第一次整风。这次整风主要是针对党内存在“思想作风极为不纯”, 老党员老干部中的骄傲自满和命令主义作风, 甚至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现象发起的。这次整风, 使干部和党员普遍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第二次整顿是1951年底结合“三反”进行的。这次整顿不同于整风, 它是一场反对腐败, 保持廉洁的大斗争, 不仅使犯有“三害”错误的人受到冲击, 而且使广大干部和党员在思想上也受到了一次大的震动。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 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 消除了我们队伍中的腐化分子, 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污毒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 使党的廉政建设收到很大的成效, 使干部党员的政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三次整顿是从1951年3、4月开始到1954年底结束的整党运动。这次整党主要是对党员进行一次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 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 纯洁党的组织, 提高党的战斗力。对有缺点错误, 甚至有严重错误的党员, 立足于教育, 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 争取成为合格的党员。对不具备党员条件的, 经教育无效, 应劝其退党。对那些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则坚决清除出党。这次整党在前两次整顿的基础上, 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进一步得到提高, 党的质量更加提高, 对搞好三年恢复时期的各项工作,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 反腐败要充分调动群众, 在一定时期内要造成一定声威。廉政建设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 反腐败要发动人民群众参加。“三反”运动之前, 党对革命队伍里曾出现的贪污等腐败现象也进行处理, 但由于没有普遍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 没有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和巨大的群众威力, 因此收效不大。而在“三反”运动中, 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 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威, 大长廉政正气, 大灭“腐败”歪风, 效果非常显著。当时党的具体做法是, 各级首长首先带头反省坦白, 主动对自己所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全面检讨, 同时要对本单位工作的缺点提出批评。首长这样做, 可以促使别的同志也都进行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 消除了群众不敢向领导和党员干部提意见和揭发错误的顾虑; 公开揭露和惩处一批压制民主、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务的领导, 为群众撑腰; 抓住大案尽快落实后公之于众, 鼓舞群众士气。

(四) 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做廉政的模范。新中国初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 不仅高度重视廉政建设, 而且身体力行, 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 处处带头, 要求全党做的, 他们自己首先做到做好, 为全党树立了公正廉洁的榜样。新中国伊始, 工作千头万绪, 百废待举, 毛泽东为新中国的事业日夜操劳, 时刻把人民的困难和疾苦挂在心上。1950年夏, 淮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灾情, 造成人民生活困难, 有一农民上树采树叶时被毒蛇咬伤致死, 他闻讯后伤心落泪, 下决心一定要把淮河治好。解放初失业问题严重, 他十分关注, 请周恩来过问此事。他十分重视人民来信, 提出要给人民提出的问题以恰当的处理, 尽可能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 不要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他本人生活俭朴, 对于子女要求很严。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 他就把长子

毛岸英送到朝鲜前线，接受火与血的考验和锻炼，最后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的两个女儿住在中南海，都在机关的大灶食堂同普通工作人员在一起吃饭。毛泽东在人事关系上的廉正也是人所共知、有口皆碑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他的亲朋故旧来信求职或反映困难的自然不少。但他总是秉公办事，严格遵守人事制度，决不以一党主席之尊，违章用私人之权。对生活确有困难的，自己则慷慨解囊，用个人的稿酬、工资给予帮助，以减轻政府的负担。毛泽东的几个亲密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坚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为政廉洁的楷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党中央主要领导的模范作用影响下，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无私忘我工作，廉洁奉公，使这一时期的廉政建设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使人民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

这一时期，由于党廉政建设搞得好，党廉洁，政府廉洁，因此，当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朝气蓬勃，精神振奋，奋发工作。顶住了内外的巨大压力，战胜了多方面严重困难，使国民经济奇迹般地迅速得到恢复，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把社会主义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美梦。

党在这个时期进行廉政建设取得的经验是极其珍贵的，有许多好的方面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廉政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和非常艰巨的工作，更何况党又是在解放初期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这项工作的。因此，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当时的廉政建设还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但这和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是瑕不掩瑜的。当前，我党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大力推进廉政建设，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就一定能把廉政建设搞好。

注释：

①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8页。

②《陈云文选》（1949—1956）第230页。

④《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第十九册，第116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29页。